

《论衡》与王充的“君子思维”

□ 马斗成 马小菲

思维是一种人类特有的精神活动,中国传统文化中的“君子”作为一种理想人格,融知识、技能、道德于一体,能够做到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,在思维道德方面具有仁、智、勇等品格,并形成了影响广泛的“君子思维”。“君子思维”是一种追求实现君子人格的思维形式,是对君子的本质、特征、作用、实现方式和发展规律等方面的认识过程。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的《论衡》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思辨性著作,该书以“疾虚妄”为宗旨,详细讨论了当时书面记载与口头流传的各类观点、言论、故事,提出了“考之以心,效之以事”原则,即一方面在心中对事物做逻辑思考、判断,另一方面以具体事件、现象来验证。由此,王充得以判断事物的是非真伪,对其中“虚妄”的内容加以批判,并提出更为合理的见解。王充的著述思维过程正体现了中华传统“君子思维”的突出特点。

敢于质疑 不囿成说

王充对于公认的权威观点并不盲从,在经过审慎思考、周密论证后,能够对其中的不实之处大胆提出疑问,表现出刚强勇毅的“君子思维”的特点与境界。

《论衡》中九《虚》三《增》12篇文章,专门针对书面与口头流传的各类虚妄说法和增饰内容进行辨析,以论定虚实。其中,《语增》《儒增》《艺增》分别针对“小人之语”——传书、“贤人之文”——儒书、“圣人之言”——经艺。如果说,对于前两者的批判还算情理之中,对于堪称“万世不易”的“经艺”的批评,则足以显示王充的勇气。汉武帝时儒学被定为官学,五经地位日益隆尊。汉代人甚至对五经进行了某种意义上的神化,如《论衡》所引,“或说《尚书》二十九篇者,法曰斗七宿也。四七二十八篇,其一曰斗矣,故二十九”,“或说《春秋》十二公,法十二月也”(《正说篇》),在时人看来,经书内容、形制与天地历数冥冥相合,更凸显其神圣不可置疑。王充却在《艺增》等篇中对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周易》中的夸张增饰之语予以辨正,表现出在权威面前“尤爱真理”的无畏气概。

经艺出自圣人之手,汉代人将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武、周公、孔子等视为圣人。王充不仅举出关于孔子、周公言行的16条例子,说明圣人并非“生而知之”,更在《问孔》篇中对孔子部分言行予以批驳。如针对《论语》记载的“宰予昼寝”一事,王充认为孔子责骂太过:“使宰予性不善,如朽木、粪土,不宜得入孔子之门,序在四科之列;使性善,孔子恶之,恶之太甚,过也。”这样的批评,不仅在当时石破天惊,甚至在王充身后仍持续引发非议。清乾隆帝在读到《论衡》中《问孔》《刺孟》篇时便大为光火,称“已有犯非圣无法之诛”。这亦从反面验证了王充敢于质疑权威的非凡魄力。

对于汉代思想界主流的“天人感应”理论,王充同样不以为然。汉代天人感应理论主要作用于政治领域,其核心思想即以君主为代表的统治阶层的善恶行为会引发天的反应,体现为灾异和祥瑞的形式。王充则坚持“天与人不相应”,认为自然现象发生有自身规律,不以人的行为为转移,《论衡》中专门有《寒温》《谴告》《变动》《明雩》《遭虎》《商虫》等多篇,对于各种自然与人事的所谓对应一一予以反驳。值得一提的是,汉儒构建的天人感应理论,一方面借上天之威对君主言行进行约束,另一方面也借上天之势凸显君主作为“天意代表”的权威。王充的做法意在割裂天与人的关系,在当时甚至可能招致政治风险,在这种情况下依旧敢于质疑主流、挑战权威,足见王充的勇气。



王充的《论衡》

以真为美 化民成俗

王充对各类说法、观点进行详细的论证、分析,论定是非,去伪存真,看似出于对知识的追求,其实背后亦有道德用意,体现了王充作为君子的社会责任感。

在王充看来,是非、虚实、真伪、然否,不仅是逻辑评判,更有价值内涵。真、实、诚,如同仁、义、忠、孝一般,都代表“善”,虚、妄、伪则代表“恶”。换言之,王充将“真实”看作一种道德品质。《对作篇》中,他指出,“圣人作经,贤者传记,匡济薄俗,驱民使之归实诚也”。“案《六略》之书,万三千篇,增善消恶,割截横拓,驱役游慢,期便道善,归正道焉”。“驱民归实诚”的目的是“增善消恶”“道善归正”,可见实诚即为“善”,即为“正”;他强调,“是故《论衡》之造也,起众书并失实,虚妄之言胜真美也”,可见真即为“美”。而在先秦两汉的语境中,“美”又与“善”同义,因此,在王充看来,真、善、美是统一的。正因如此,面对虚妄之言胜真美、伪书俗文多不实诚的局面,王充认为这是“人间有非”,如同面对其他丑恶现象一

样,他对此深感不安与激愤,必须攻之而后快。王充坚信,对虚假的贬抑、对真实的弘扬,本身就能增善消恶,就能化民成俗。那些论定虚实、真伪、是非、然否的文章著作,从某种角度来说都在做着教化的努力。王充高度赞扬孔子的《春秋》,即源于《春秋》褒贬是非颇为得实。他在近世文人中最为欣赏桓谭,也是因为桓谭之《新论》讨论世间事,能够明辨是非曲直,使得虚妄之言、伪饰之辞皆无所隐藏。王充作《论衡》,便是希望踵《春秋》与《新论》之后尘,以真实来教化民众,以达到人人讲信修睦的美善境界。这是王充辨明各类事物的根本动机,也是他写作《论衡》的根本目的所在。

综上,王充《论衡》一书卓尔不群的思辨活动贯通了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等几大环节,在思维道德方面熔铸了仁、智、勇等君子品格,充分展现了中国式“君子思维”对知识、技能与道德的融汇发展。

据《光明日报》



近日,由北京市文联、北京师范大学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“文学京彩季·北京作家2023精品研推工程第四期——吕铮作品研讨会”在北京市文联举行,2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吕铮长篇新作《打击队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)展开讨论。

吕铮是80后公安作家,曾获第四届茅盾新人奖、第七届“北京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”称号,作品连续5次获得公安部金盾文学奖等奖项。多年来,他深耕公安题材创作,出版作品近20部,《名提》《猎狐行动》《三叉戟》《纵横四海》等不仅引起文学界关注,更激起广大读者和观众的强烈共鸣。长篇新作《打击队》主要描写了辅警邵晓阳因意外破获大案被特招人警,分配到小满派出所打击队工作后发生的故事。主人公邵晓阳小名“太阳”,性格热情阳光,他笃信正义、责任心强,将打击犯罪视为警察天职;来到打击队后,他却发现面临团队缺乏战斗力的局面。随着故事推进,邵晓阳不负领导期望,在打击队引发“鲑鱼效应”,在与队友一次次的价值观碰撞中,他的理想、信念、责任、使命,唤醒了大家从警的初心,最终与队友通力合作破获了大案。

《打击队》首发于《人民文学》2023年第1期。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、《人民文学》主编施战军用“正”“常”“人”3个字来评价这部小说,“正”既指对社会生活的正视,又指小说传递的理想气质;“常”指小说写出了人生的常态和社会的常态,充满生活细节与人生常理;“人”则指小说写出了人情、人心和人性。我认为吕铮秉承着《红楼梦》式的正邪观,每个人都不是完人,都有性格的弱点,但并不影响他们人性整体上的光辉。吕铮也把自身性格当中最有温度、最有光彩的一面放到了书里”。

全国公安文联副主席张策谈到,吕铮的创作与公安职业密不可分,公安职业成就了吕铮的创作,他的创作实践又提升了公安文学的创作水平,突破了类型小说的窠臼。作品有浩然正气,叙述语言由北京方言和公安行话融汇,特色鲜明。

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莉总结说,吕铮是当下公安文学优秀作家的代表,他生活经验丰富,写作功底扎实。通过《打击队》能感受到作家“召唤生活”的本领,书中塑造的人物和构造的场景给人真实的感觉。

《打击队》作者吕铮最后说,每一个文学创作者都是孤勇者。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在孤勇中把笃定的信念坚持下去,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好。

据了解,2022年9月开始,北京作协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实施“文学京彩季·北京作家精品研推工程”,以石一枫、星河、文珍、孙睿等作家的作品为研讨对象,召开多次作品研讨会和改稿会,邀请老中青各个年龄段的优秀评论家参与,深度研究和重点推介文学精品,促进北京文学高质量发展。

据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

《打击队》：绽放从警初心的光芒

□ 王筱卉